◆观 点

打破公共数据的部门垄断

近年以来，大数据产业发展备受关注，据新华社报道，在我国，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则受制于一些政府部门对于公共数据的垄断。

以百度地图为例，由于政府的地图资料信息不公开，企业只能被迫自己采集信息进行标注，相关人士抱怨，“地图上的公交服务信息应由政府免费提供，但实际上这些信息都没有公开，我们只能挨个跟公交公司谈，不仅资源浪费严重，而且效率非常低下”。

政府部门所掌握的许多公共数据，不仅可以用于社会管理和服务，其如果向社会开放数据平台，这些数据可能会获得进一步挖掘和应用，提高社会生产力，使社会运转更高效。GPS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就是个最典型例子，该系统前身为美国军用系统，冷战结束后，该系统被开放给公众使用，并且在此后取消了对民用GPS精度的限制，由此掀起了GPS产业和应用热潮，形成了百亿美元的新市场，如今我们生活中GPS的应用可谓无处不在。

与之相反的，政府部门对公共数据垄断，将会增加社会成本、阻碍社会进步。对于企业信息的查询，有的地方只是在网上公布企业的基本信息，但有的地方信息仍然不公开，不拿着律师证跑到当地工商局大厅就查不到，而且查询还要收费。

正是看到“数据公开”巨大价值，国际上普遍重视政府数据平台的开放和应用。2011年9月，美国、英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非等国共同发起成立“开放政府联盟”，该联盟承诺向本国社会公开更多的信息，包括各种公共服务、公共活动的数据等等。在有的国家建立的政府数据公开网站上，你可以查到人口统计信息、用电量、犯罪记录、中小学教学评估、地铁公交实时运行数据、小区噪音指标等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

应当说，在我国，“数据公开”并不存在多少技术性障碍，许多政府机构都有自建的内部数据平台。但是，这些机构往往把这些数据当成部门的私有财产，莫要说与外界分享，就是政府机构内部的互联互通都成为问题，由此导致的最典型问题就是办事难，公民为办一件事情重复地填表格，一个部门接一个部门提申请，盖公章。

这种公共数据的部门化、垄断化，无疑与社会开放的潮流相悖。须知，政府数据也是一种公共财产，属于全民所有，政府数据取之于民，也要用之于民，不能让部门利益成了公共利益的绊脚石。政府非涉密数据更加公开，更广泛地服务民众，服务于社会创新，受益的不仅是民众，也会给政府的公共治理，带来莫大促进和改善。（2015年2月26日《新京报》于平）

农地入市须防基层政府滥权

2月25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开幕，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的议案。按照议案，在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可以暂时停止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和第六十三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九条关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出让等的规定。

在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没有修订的情况下，启动农地入市改革，是需要足够的胆略和魄力的。土地作为最为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农民的命根子，一旦这方面出现问题，影响可想而知。但是，如果这一步不迈出，农村改革要想向纵深推进，难度也可想而知。

可以肯定，试点工作的展开，将对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和观念转变等，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农村人口的流动，也将在新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出现新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还可能会带来农民的反流。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试点不仅在土地流动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而且土地流动的审批、政策的执行和管理等，也按照简政放权的要求，下放给了地方。其中，使用存量建设用地的，下放至乡（镇）人民政府审批，使用新增建设用地的，下放至县级人民政府审批。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的作为，将对此次改革试点至关重要。

必须看到，在农地入市的政策大门没有正式敞开前，一些地方实际已经进行了初步探索。如由村级组织负责，把农民的土地集体承包给一些种粮和种植经济植物的农民。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政策和标准，这方面出现的问题也比较多。如农民和承包者利益双重损害，一些地方的村级组织擅自撕毁合同等。

而从目前各地撤村建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来看，如何给失地农民建立相对稳定、可靠、有效、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下一步农村土地改革试点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做支撑，农地流转就极有可能出现让农民集体返贫的现象。在一些地区，失地农民住进高楼、生活贫穷的现象还是不同程度存在的。

按照以往的经验，一些地方政府在涉及农民利益方面，包括专项拨款、专项资金、扶贫救济等，常常会做出损害农民利益、截留资金等方面的行为。那么，农地租赁、转让、入股等就更容易暗箱操作、私下交易、截留收入。如何预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在推动农地入市改革试点过程中，要防止地方政府、村级组织与极少数人勾结，利用行政手段强行将农民的土地以租赁、受让、参股等方式，集中到他们手中，然后再通过转租、二次转让、股权流转、将土地卖给城市人建房等，从中牟取暴利和私利，引发各种腐败问题。这也需要相应设计农地入市的标准流程，杜绝暗箱操作，侵吞农民利益。

允许农地入市，是农村土地改革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只有规范好地方政府的行为，提前扎好制度的篱笆，并强化监督检查机制，才能让农地入市改革真正让农民受益。（2015年2月27日《江苏经济报》心旌）

应对通缩需消除三种倾向

从目前经济运行实际看，通缩确实降临。一方面，宏观经济数据不乐观；另一方面，CPI指数连跌。而且，尽管中国目前货币、信贷存量巨大，但被过剩产能、无效投资以及非实体经济高回报领域大量挤占，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领域、具有流动性货币资金相对不足。同时，外汇占款减少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减弱，银行吸存能力和放贷能力下降，使货币总量呈现下降趋势。

从当前看，应克服三种不良倾向：一是克服麻木不仁倾向。不能被目前巨额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巨大存量表象迷惑，对通缩表现出无所谓心态。2014年末我国M2余额虽达122.84万亿元，是2007年3倍，远高于同期产出(GDP)增速，但增速放缓，且货币供应量发挥经济增长功效降低。尤其巨额贷款被许多企业盲目扩张导致大量经营失败占用，成了过剩产能和无效投资，已失去了流动性。因此，政府决策层及经济职能部门既要有危机感，又要消除无所作为思想，积极出台各种应对措施，灵活实施货币财政政策，根据当前经济走势，适时实施降准和降息政策和减免税优惠，防止货币政策调控错位和财政调控不力，发挥货币财政政策抵消通缩功效。

二是克服货币万能倾向。不能中扩张货币政策之邪，过分迷恋或倚重降准降息之功效。降准降息虽具有刺激工业生产反弹、缓解实体经济资金之困功效，并对巩固经济增长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宽松货币政策是把双刃剑，如果无度使用，虽会缓释通缩，但必然会带来货币贬值，加快通胀风险来临，尤其如果对商业银行资金缺乏引导和监督，大量资金流向楼市、股市及产能过剩、“三高”产业，会更增加社会资金无效流动，不仅无助于改变当前通缩局势，还使银行出现更多不良信贷资产，带来严重经济“后遗症”。因此，货币调控政策应宽松适宜，掌握好度，不宜滥用，尤其要加大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监管力度，理顺降准降息释放资金去向，让资金真正流入实体经济。

三是克服财政“兜底”倾向。不能把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当作抵制通缩的最后“杀手锏”，要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提高使用效益；如果通过发行国债等手段盲目扩大财政赤字，一味追求投资拉动效应，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向回报期长、见效低的基础设施项目，再走过去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投资老路，会导致投资低效症复发，只会把财政拖入困境。

因而，当前财政应分三步走：首先，加大精减行政审批和减税让利力度、激发中小微企业和民众创业、创新活力，扩大社会就业面，最终达到拉动社会消费增长之目的。其次，出台政策引导民间投资，打破行政体制性壁垒，将国有垄断领域全部向民资开放，通过PPP（政府与民资合作投资）模式，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减轻财政投入压力。再次，掌握好投资与消费比例，确保二者均衡，加大财政对民生保障工程如安住工程、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支出，消除民众消费后顾之忧，提高民众现实消费能力，从而扩大内需对经济拉动作用。

除此之外，各级政府应积极扶持外贸企业发展，出台优惠财税政策，提高外贸企业生产能力，扩大商品出口额，扭转当前贸易放缓致使创汇能力下降的不利趋势，从而提高央行基础货币乘数效应，改善货币总供给状况。（2015年2月28日《上海金融报》莫开伟）

◆纵 横

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观察和思考

春节期间，一篇名为《博士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及微博等社交媒体疯传，作者王磊光系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他在文中分享了自己春节返乡的所见所闻，通过铁路交通、乡村婚丧嫁娶新貌到读书人的境遇等，以富有情感的笔触展现出个人对当下乡土中国的观察与思考。

在王磊光看来，这篇“长微博”只是普通的生活见闻，却出乎意料地触动了一大批读者，尤其是在春节假期这样特殊的日子里，引起了众多与他有着类似经历的读书人的共鸣。或许正如王磊光所言，这只是一个媒体事件，自己不过是“不小心卷入了其中”，但由此开启的对乡村乃至更为广阔的现实问题的讨论，却尤为值得言说。

“爆红”的博士返乡笔记，并不是严谨的学术报告，而像是一个知识青年的社会观察随笔，在字里行间满溢对家国现实的关切，更不乏用心体验独立思考的精神。在信息生产与传播日益驳杂的冲击下，仍怀有“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去观察和理性思考现实问题的热情，已经越来越不可多得，这大概也是返乡笔记最珍贵的地方。

今天，生活在一个由网络、数据构建的世界，我们更易于获知信息，我们甚至因此作出一种判断，认为自己比以往任何时期的人都更了解身处的时代。我们读取信息，观看视频，从电视、电脑、手机等媒介渠道认识自己熟悉乃至不熟悉的环境，以为那就是社会的真相和全部。观点市场中，许多看似严肃的深刻讨论，建立在残缺和不实的真相之上。通过编辑、裁剪、拼接构建并推送到你眼前的世界取代了现实的世界，仿佛比现实更真实。那个只能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心体验，从而认知现实世界的日子离现在并没有多远，但越来越多的人却在渐渐忘记和失去这种观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的能力。而转型社会中的“无力感”，更加速了一些人对现实的逃避。

缺乏观察鲜少思考，或者果断置身事外，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判断的简单化。在不少复杂事件的来龙去脉还没有弄清楚之前，武断的结论早就先行一步。一桩事摆在面前，当然不是对的就是错的，除了好就是坏，“点赞”或“吐槽”是最直观的呈现。在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有的不是还原事实、分析成因、寻求改善方案的“构建”态度，而是为了支持而支持，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情绪性跟风。这种“站队”式的思维模式，自然可以联系到曾经特殊的历史时期，但在鼓励包容、开放、创新的当下，继续这么妄下定论，实在不合时宜。

客观而言，王磊光的返乡笔记说不上高深，也未必蕴含洞见，但他特意坐上“绿皮车”观察你所忽略的、来自社会某些阶层的群体，以田野考察的方式去探寻和思考正在乡村发生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变化，无疑在各个层面上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思考的当代样式。而这个社会的所有改进的可能，无不开始于这样的反思。（2015年2月26日《长江日报》李杏）

◆史海钩沉

不敢马虎：欧阳修之誓

“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语出《韩非子·显学篇》，强调基层历练对于高级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一个宰相没有过实实在在的基层工作经验，终归还是要差很多的。

北宋名臣之中，欧阳修的体会一定是极深的。在那个以锦绣文章博取进士科名，以进士科名决定官场前途的时代，欧阳修实在是太出类拔萃了。所以，他很年轻就进入皇家宫殿成为皇帝的文馆侍从，本来是不可能再有基层县政经历了。他30岁出任峡州夷陵县（今湖北宜昌）令，则全然出于政治迫害，是当权者排斥异己的结果。然而，这段县令经历，后来却被欧阳修终生视若珍宝。

欧阳修初到夷陵，想要找一本《史记》或者《汉书》来打发时间，可是搜遍了夷陵县衙和私人书橱，竟然一无所获。《史记》和《汉书》是当时最常见的历史书，夷陵之偏僻落后，由此可见。联想到京都开封的繁华舒适，欧阳修倍感凄凉。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则让欧阳修彻底忘掉了个人的不幸。

找不到书，欧阳修就只好拿了“陈年公案”反复阅读，结果却读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但见其中冤假错案不可胜数，无中生有的，颠倒黑白的，徇私枉法的，灭亲害义的，无所不有。欧阳修惊呆了，夷陵这样一个荒凉偏远的小县竟然如此，那么，整个宋朝又当如何，是可以想象的。他放下卷宗，对天发誓：从此之后，对待任何事情都绝不敢马虎！就在那一刻，欧阳修完成了从读书人到政治家的伟大跨越。

欧阳修后来官至副宰相。他晚年回顾夷陵经历时，曾说，到今天三十多年了，我遍历中央和地方，甚至做到了三公，都是拿“不敢马虎”这句话来自励的。今天别人看我，都以为我是因为文章写得好才有这地位；我自己看我自己，谅必是当时在夷陵那一句誓言的回报啊！

欧阳修做过开封知府，他的前任是著名的包青天包拯。包拯的作风是“以威严御下，名震都邑”，的确是“黑脸”的。欧阳修的作风却是“简单平易，一切按道理来，不追求赫赫之名”。有人劝他向包拯学习，欧阳修回答说：“每个人才能脾气不同，不能强求一律。”这是个很谦虚的说法。事实上，欧阳修对于地方官的“治民”施政，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治民就像是医生治病。有的医生派头极大，说得天花乱坠，可是药到病不除，远不如衣着简朴、言语木讷而药到病除的。治民，不管他的才干是否出众、政策措施是否漂亮，但民称便，即是良吏。

判断一个官员是否是良吏好官的唯一标准，是老百姓是否觉得方便，这就是欧阳修的政绩观。这种政绩观的结果就是不求政绩。欧阳修当过好几个州的长官，从来没有像样的政绩，也不求声誉，治理风格宽松简单，不扰民。曾经有人向他请教“为政宽简而不荒废事务”的秘诀，欧阳修回答说，我所说的宽，是不苛刻急切地去满足上司的要求，我所说的简，是不要繁琐细碎什么都管。那么，欧阳修宽简治民的效果如何呢？“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在任时老百姓觉得方便，离任后老百姓怀念。

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很多晚辈后生慕名求见，欧阳修也乐于接见，然而，他从不谈文章怎么写，却喜欢讲做官的道理。为什么呢？用欧阳修自己的话说，“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润身”指增强个人修养，“文章”的作用其实也止于“润身”——当然，作为文章大家，欧阳修完全有资格这么说，那是他的谦虚，也是他的骄傲。所谓“政事可以及物”，是说政府的决策、官员的行为会影响到治下每一个老百姓的福祉，所以，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必须审慎，“对待任何事情都绝不敢马虎”——这是欧阳修践行终身的誓言。（2015年2月16日《北京日报》赵冬梅）

◆评 论

清理司法考核仍需一张“清单”

在上月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明确要求中央政法各单位和各地政法机关，要对各类执法司法考核指标进行全面清理，并坚决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前日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中，亦重申废止违反司法规律的考评指标和措施，取消任何形式的排名排序做法。

然而，就在年前举行的地方两会上，一些不合理的考核指标仍被作为政绩写入法院工作报告。中央和地方在推动司法改革上的不合拍，让围观者平添了些许忧虑。

据财新杂志报道，在今年一月下旬至二月上旬召开的省级人大会议上，部分省级高院工作报告罗列和引用的司法考核指标多达40项，饱受诟病的调解率、服判息诉率甚至进京信访比等均赫然在列。如在安徽高级法院工作报告中，就有这样一段表述，“24项评估指标有17项同比增益；一审服判息诉率91.07%，二审改判发回率0.74%；进京访案访比882.4：1，位列全国第二，好于357.9：1的全国平均水平”。有必要追问的是，这“24项评估指标”是谁所设？又是谁在评估？其内容和范围包括哪些？而“全国第二”的排名显然不是安徽高级法院所能排出来的。那么，在最高法院公开宣布“取消任何形式的排名排序做法”之后，又是哪家机构仍在对“进京访案访比”等指标进行全国排名？

面对如此现实，有关部门理当展开调查，并及时处置，以维护新一轮司法改革统一推进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并给各地政法机关以坚定和明确的改革指引。本来，取消不合理司法考核项目是众望所归。中央政法机关在公布这一改革举措之后，舆论普遍给予好评，但也有应防止各类“考核指标”变脸重来的种种担心。现在看来，一些不合理的考核指标连“脸”都没“变”，就我行我素地出现在众多法院工作报告中。“全面清理各类司法考核指标”遭遇了一股无形的阻力。找到这股阻力并克服之，将是这场司法考核变革的希望所在。

通常来说，基层法院受各类考核之苦久矣，他们对“全面清理各类司法考核指标”的要求最迫切。高级法院处于最高法院和基层法院之间，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高级法院还承担着“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重任。如何正确区分和协调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现在看来还任重道远。

改革越深化，越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强化执行力层面来看，“全面清理”的具体展开仍需要进一步细化。比如，“坚决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在上述列举之外，其他司法考核指标还有哪些属于“不合理”且需“坚决取消”之列？若有一张明确的取消清单，不光各级政法机关好操作，各地人大也好拿来对照审议。（2015年2月28日 中国网）

◆文 坛

为理想留个座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只有廖厂长例外》。其中写道：“有人问我，如此众多的企业家、有钱人，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位呢？我想了很久，然后说，是廖厂长。”

25年前，一张匿名“廖厂长”的人汇出的7000元汇单，温暖了一群年轻学子的青春旅程；25年过去了，一则寻找“廖厂长”的微信，唤起了无数人对理想和家国情怀的追问……

2014年10月25日，时隔25年后，吴晓波与廖群洪终于在湖南洪江古商城重聚。见面会上有一个仪式性的环节。吴晓波和廖群洪一起为“创业公益金”揭幕。

“廖厂长”的故事，之所以能拨动人们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神经，说明“廖厂长”成了当今社会的稀缺品。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绝学，曾是士大夫心里坚守的“理想国”；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敢做梦、能圆梦的时代，梦想变成现实的距离，已越来越清晰地进入每个人的眼帘。个人梦想与国家、民族梦想的契合、重叠，就合成了我们的理想。

选择坚守、选择理想，才能拥有饱满的人生。

翻开历史，越是大发展、大变动的时代，越需要有超越个人、超越利益的理想。“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几年前，媒体评论员卢新宁站在北大讲台上的一番激情演讲，曾让很多人汹涌澎湃，让人感觉，理想之光并未远去。有了阳光、水分、土壤的存在，绚丽的理想之花依然鲜艳。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坚信，吴晓波和廖厂长的重逢，不是一个故事的简单结尾，而是许多新故事的开始。在故事的演绎中，我们心中就能愈发清晰地为理想留着它该有的位置。（2015年2月13日《光明日报》评论员）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